

逻辑理论在俄汉翻译中的运用

翻譯的藝術

阎德胜 著

電子工業出版社

(京)新登字第 055 号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列宁关于“任何科学都是应用逻辑”的论断为依据,以丰富的翻译实践经验与新颖实用的翻译素材为基础研究论证:翻译科学也是应用逻辑,进而以概念、判断、推理、逻辑规律这些基本逻辑方法的巧妙运用,来探讨提高外汉翻译水平、改善译作质量的有效途径。该书是首次较系统地与普通逻辑学的角度来研究翻译理论与实践的一部学术专著,填补了我国译学的一项空白。

本书读者对象:俄语翻译工作者和其他外语翻译人员,以及翻译理论研究人员、外语教师和广大学生。

翻译的艺术

阎德胜 著

责任编辑:李秀中 李继东

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北京市万寿路)

电子工业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大连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6字数:132千字

1993年12月第一版 1993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定价:10.00元

ISBN7-5053-2112-9/H·41

前 言

本书第一稿是在1979年写成的油印教材《俄汉翻译教程》。1981年做了全面修改，写成第二稿《俄汉翻译技巧》。1983年改写成第三稿《俄汉逻辑翻译方法》，油印成册做翻译教材之用。

第三稿作为内部翻译课教材已试用多年。这期间，笔者积累了丰富的翻译实践经验，提炼出有重要研究价值的翻译素材，归纳、总结、升华出新颖实用的逻辑翻译理论，为进一步改编第三稿准备了充足的物质条件。于是，最近着手对该稿进行了全面、认真的修改，参考了国内外有关逻辑翻译研究的某些最新文献资料，写成这第四稿《翻译的艺术——逻辑理论在俄汉翻译中的运用》。可见，《翻译的艺术》一书，乃是作者将多年从事翻译实践和翻译教学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和资料，与学习普通逻辑（形式逻辑）理论相结合而进行外语翻译探讨的一项研究成果，也是我国翻译界各外语语种的翻译研究著作中首次较为系统地 from 普通逻辑学的角度来研究外汉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的一部科学专著。

在写作过程中，笔者曾得到《逻辑与语言学习》、《中国翻译》、《外语与外语教学》、《外语学刊》等杂志社的编辑部，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等单位专家学者的热情支持与鼓励。他们有的先期发表了根据本书有关内容改写成的逻辑翻译研究文章，给笔者以很大的鼓舞与动力，有

的审阅书稿并提出宝贵意见。例如，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王松益编审不但认真审阅初稿，而且还对全书的理论体系和学术价值做出进一步的概括与肯定：书稿“从普通逻辑学的观点阐述了提高翻译水平的途径，从对翻译实践经验的总结上升到翻译理论的高度。这一点很有启发，十分重要。事实上，任何一种外语的文章要译成汉文……关键之一，就是学习和运用普通逻辑学”，“这一逻辑翻译理论的提出，无疑将推动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对我国现代翻译学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这就大大增强了笔者的心事和使命感。各有关杂志社的编辑部以及其他学术机构的专家学者对书稿内容的充分肯定与珍贵建议，便成了这本小册子成书和校正时重要的指导方针和原则。借本书出版的机会，笔者对以上各单位、各专家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中作为译例的俄语句、段和文章虽未注明出处，但都是有所依据的。它们一部分选自前苏联俄语书刊，一部分选自我国高等学校的俄语教材，一部分选自国内出版的其他有关书刊。

由于作者语言水平和逻辑知识肤浅，翻译经验不足，又是在新的研究领域中探索，因而书中缺点、错误和疏漏在所难免，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阎德胜

1993年春节

目 录

前言	1—2
第一章 绪论 翻译活动的哲学实质	1
第一节 传统翻译理论的观念更新	1
第二节 两种语言差异的历史渊源	3
一、约定俗成的语言习惯	3
二、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思维角度	6
第三节 翻译活动的哲学实质	8
第二章 概念明确	11
第一节 概念与翻译	11
第二节 概念的可变性	12
一、连词功能多变	13
二、代词抽象概括	19
三、词义合理搭配	22
四、词语准确应用	24
第三节 概念的属种关系	30
一、增加词语	31
(一)狭义并列属种关系的翻译	31
①增加指代词“其他(其余)”	31
②增加关联性质的词语	36
③增加实词	37
(二)广义并列属种关系的处理	39
二、删减词语	42

第四节 概念的限制	47
一、增加词语	48
(一)增加各类词语 合理限制科学概念	48
①增加名词	48
②增加动词	49
③增加代词	50
④增加数词	50
⑤增加形容词	51
⑥增加副词	52
(二)同一词语加词 构成多种限制概念	52
二、转换语形	55
(一)转换语言形式 合理限制科学概念	56
(二)同一词语换形 表达多种限制概念	57
第五节 概念的概括	61
一、删减词语	61
二、转换语形	63
(一)转换语言形式 合理概括科学概念	64
(二)同一词语换形 表达多种概括概念	65
第六节 篇章逻辑对概念限制与概括的决定作用	67
第七节 定义的运用	70
一、科学定义	70
二、语词定义	76
第八节 小结	79
第三章 判断恰当	81
第一节 判断与翻译	81
第二节 补足主概念	83
一、补充主概念	83
(一)俄语不定人称句的翻译	83
(二)俄语无人称句的处理	84
二、补足主概念本身	85

第三节 转换主概念·····	86
第四节 补足宾概念·····	87
一、补充宾概念·····	88
二、补足宾概念本身·····	88
第五节 转换宾概念·····	89
第六节 补足联系词·····	90
一、补充联系词·····	90
(一)补充模态词·····	90
①能愿词·····	91
②时态词·····	92
(二)增加普通动词·····	94
二、补足联系词本身·····	95
第七节 转换联系词·····	96
一、模态词的使用·····	96
二、判断词的使用·····	97
三、普通动词的使用·····	98
(一)转换语形·····	98
(二)转换词类·····	99
第八节 小结·····	100
第四章 推理严密·····	102
第一节 推理与翻译·····	102
第二节 类比推理·····	103
第三节 归纳推理·····	106
第四节 演绎推理·····	108
第五节 复杂推理·····	111
第六节 省略式推理·····	117
一、句式并列语法关系的翻译·····	118
二、句式其他语法关系的处理·····	119
(一)单句·····	119
(二)复句·····	120

三、篇章结构的逻辑分析·····	125
(一)句群·····	125
(二)段群·····	128
第七节 小结·····	131
第五章 逻辑规律·····	133
第一节 逻辑规律与翻译·····	133
第二节 同一律·····	134
一、概念同一·····	134
(一)术语同一·····	134
(二)习语同一·····	139
(三)事物同一·····	141
(四)人物同一·····	144
二、判断同一·····	147
(一)调整主语 语义贯通·····	149
(二)调整谓语 语气顺畅·····	151
(三)段群处理 判断统一·····	153
第三节 排中律·····	157
一、用语明确 避免含糊·····	157
二、前言点题 提纲挈领·····	162
三、标题传神 画龙点睛·····	164
第四节 矛盾律·····	170
第五节 小结·····	181
主要参考文献·····	182

第一章 绪 论

——翻译活动的哲学实质

第一节 传统翻译理论的观念更新

多年来,两种语言翻译活动中的习惯势力,使人们每每接触到翻译,首先想到的只是两种语言形式的相互转换。传统的翻译学者,也正是在这一外语操作的基础上做文章,使之条理化、模式化,形成翻译的语言学理论,其基本的论点可概括为:翻译是语言活动。但是,众多翻译领域的实践经验证明:无论词语的恰当处理还是句段的合理翻译乃至篇章上下的有机联系而浑然一体,这里单纯的语言活动常常无法奏效。因为传统的“语言学理论难以驾驭翻译的全过程,语言和思维有密切联系,只研究语言而不探讨思维不能诠释翻译的本质”。(刘祖培《翻译综合思维论》)可见,对翻译起着决定作用的是特定语言环境的逻辑研究,翻译活动中的决定因素是思维活动。

正因为如此,国内持翻译语言学理论观点的专家学者,也从自身的翻译实践中领悟到这一点。陈廷佑先生在《英文汉译技巧》第38页指出:“作为译者,……光讲语法是不够的,还要看上下文、讲求逻辑”,“看上下文实际就是看逻辑关系”。张培基教授等在《英汉翻译教程》中说: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辩证的,把语言同思维联系起来,强调了翻译过程中的思维

因素。田建国等在《科技英语翻译概要》一书第6—7页指出：“译者要使自己的译文达到翻译标准，必须对翻译的思维过程有一个正确的理解。”蔡毅教授在《俄译汉教程》中多次指出逻辑分析与逻辑推理在翻译中的重要作用。例如第17页指出：“根据上下文仔细推敲，进行逻辑推理，这是确定词义过程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步骤。”

国外语言学界和翻译界有关逻辑研究的成果也在对传统的翻译语言学理论发起挑战。前苏联语言学家巴尔胡达罗夫教授在《语言与翻译》第19页讲到：“我认为不可能把翻译理论建立在纯语言学的基础上。”西德学者K·赖斯指出：“翻译过程绝不单纯是语言活动。”（胡真《安娜·利洛娃翻译理论概述》，《中国翻译》1988年第5期）匈牙利翻译家拉多·久尔吉的观点十分明确：“翻译是逻辑活动，翻译作品是逻辑活动的产物。”（罗进德《翻译单位——现代翻译学的一个研究课题》）

国内外专家学者的上述精辟论断，有力地震撼着传统的翻译语言学理论基础，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两个民族语言的翻译活动是人的思维活动，翻译的过程是思维活动的过程。人们从自身的翻译实践中亦领悟到，翻译学这门科学乃是一门应用逻辑学。正如列宁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186页所讲：“任何科学都是应用逻辑。”“把逻辑用于医疗领域、法律领域、教育领域，找出其规律来，就分别形成医疗逻辑、法律逻辑、教育逻辑。”（张静虚等《形式逻辑答问》第4页）就是说，医疗科学、法律科学、教育科学都是应用逻辑。同样，把逻辑应用于两种语言文字的翻译，便是翻译逻辑。可见，翻译科学也是应用逻辑。

第二节 两种语言差异的历史渊源

把两种语言的翻译活动看作思维活动,把翻译科学视为应用逻辑,乃基于两种语言差异的由来所在。两个民族语言的差异,一是来自各个民族独具的约定俗成的语言习惯,一是来自各个民族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思维角度。

一、约定俗成的语言习惯

普通语言学是研究人类语言的一般规律的科学。狭义的一般普通语言学,专门研究语言学中的一般理论问题。语言是人类社会中的一种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它是社会现象,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它跟社会上的一切活动、各民族的特性、历史的发展、文化的进步等各种因素都有极其密切的联系。这就决定了语言与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发展史以至史前史等因素,都有不可忽视的联系。可见,一个民族,其语言产生的因素是多种的。一个民族的语言习惯,它的形成有其独具的历史渊源,乃是该民族特有的历史条件、生产发展、生活习俗、意识形态、文化背景的产物。因此,各个民族都有其约定俗成的语言习惯。这些在历史上约定俗成的语言习惯,常常不能用现今语言中的逻辑、语法和修辞的规律进行解释。试看我们汉民族语言中的以下二例:

1. 该城市以机械制造、煤炭和**轻纺工业**著称。
2. 有些动物能传播**人和动物**的疾病。

(《辞海》缩印本第 535 页)

以上二例强调的两个并列词语,严格说来都属于“概念滥用”的逻辑语病。因为例 1 中的“轻工业”在普通逻辑上是属概念,

“纺织工业”是种概念，“属概念和种概念是不能同时并列的”。（彭先初《语法、修辞、逻辑通俗讲话》第199页）至于例2中的“人”，大家更为清楚，系指“能制造工具并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高等动物”。（《现代汉语词典》第949页）“人”自然是种概念，“‘人’的属概念是‘动物’”。（《哲学大辞典》·《逻辑学卷》第345页）所以，“人”和“动物”也不能并用。然而汉语中“轻纺工业”并列使用，“人和动物”联合并举，无论是口头语还是书面语都是常见的、通行的。

下面再看另一组语句：

3. 他**每天**都上班，只有**今天**没来。

4. 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装着**他自己**。

5. 夜晚，远远望去，**整个大楼**漆黑一团，只有李教授那一**房间**的灯还亮着。

6. 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只可看看**七月半之人**。

以上四个例句中的着重词语，都是全称肯定而特称否定（例3—5）或者全称否定而特称肯定（例6）。在汉语普通逻辑中，都是矛盾与反对关系，是不合逻辑的，因而被指责为病句。然而，这些所谓的“病句”，都是经常出现在人们的口头语或书面语中，甚至出现在现代经典作家的语言中和历史古典文学作品里。试举三例：

7. 我望望爸爸的鼻子，又望望伯父的鼻子，对他说：“大伯，您跟爸爸**哪儿都像**，就是**有一点不像**。”

（《我的伯父鲁迅先生》）

8. 到了第二天，凡是得中的人，都得到主考官家里拜老师，递门生帖。**全去了**，就是**张好古**没去。（《连升三级》）

9. **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

（《屈原列传》）

以上共列出 9 个示例,虽然都不合逻辑,但却合乎汉语语法规律。那么,在修辞上有没有毛病呢?也没有。不但没有毛病反而语义强调更为得体。因为这一类语言运用方式,正是通过故意违反矛盾律来强调效果的一种修辞方式。正因为如此,王德春教授在其主编的《修辞学词典》中将汉语这种语言运用方式单独确立为一种正常的修辞格,定名为“舛互”。具体词条是:

[舛互]chuǎn hù 辞格之一。对事物既全部肯定,又部分否定;或既全部否定,又部分肯定。……肯定是为了强调否定,否定是为了强调肯定。因此,运用舛互,可加深语意。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上面这 9 个汉语示例,都是合乎汉语语法和修辞规律而不合汉语逻辑的惯用句式。从普通语言学的角度看,不但汉语有这类约定俗成的语言习惯,俄语、英语以及其他西方语言都有这一类只合乎本民族语法修辞习惯而不合逻辑的语句。但是,要将这类语言现象译成汉语,就需要通过“加”、“减”、“改”各种翻译手段予以恰当地处理,才能将它们译成符合汉语逻辑、语法修辞习惯的规范汉语。例如,在俄、英语中出现的“地球和行星”、“机床和机器”、“弹性和物理性能”等一类并列结构,译为“地球和其它行星”、“机床和其他机器”、“弹性以及其他物理性能”,或者译成“地球等行星”、“机床等机器”、“弹性等物理性能”,便是如此。当然,有人会说,西方语言中也常能见到“地球和其他行星”这种原文就带“其他”一限制词的合理用法。这又做如何解释?其实,这正好说明:西方民族从多年的语言实践中已经发觉,“地球和行星”并列使用违反本民族的语言逻辑,因而想通过增加“其他”一限制词来变革语言史上形成的这一惯用结构形式。但是,几百年乃至几千年约定俗成的语言习惯业已根深蒂固,难以彻底改变。因此,现代西方语言中就出现表达这同一思维内容的两

种矛盾的语言形式——一个是“行星”中排除“地球”(地球和行星),一个是“行星”中包括“地球”(地球和其他行星)。考察我们现代汉语,也能发现这种情况。例如,现代汉语在处理“人”和“动物”这两个概念中前者是被包含、后者是包含的概念的关系时,一方面存在着如前面例2所示历史上形成的“人和动物”这一违反逻辑的并列结构——“动物”中排除“人”;一方面又存在着后来的语言实践中形成的合乎逻辑的并列词语“人和其他动物”——“动物”中包括“人”。因为人们在语言活动中意识到,需要分清“人”和“动物”这两个概念中前者是被包含、后者是包含的辑关系。下面从有关文献中摘录三例,以说明汉语中的这一矛盾情况。

10. 但也有一小部分微生物能使人或动、植物致病,称病原微生物。
(《百科自学大全》第212页)

11. 微生物学是研究微小生物的形态、结构、生命活动及其与人类、动物、植物和自然界的相互关系的科学。(同上)

12. 许多低等动物是人和其他动物的寄生虫。

(《辞海》缩印本第535页)

以上外汉两种语言,表达同一思维内容都存在着互相矛盾的两种语言形式。这恰好说明,普通语言学所研究的各民族语言的一般规律性和普遍性,是客观存在的。同时,也有力地说明,我们从普通语言学的理论出发探寻外汉两种语言的差异进而从思维逻辑上来研究和探讨两种语言翻译的规律和方法,是完全正确的。

二、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思维角度

人们还记得,1971年周恩来总理和美国的基辛格讨论起草“中美上海公报”时,基辛格曾经说过,我们东方人的思维习

惯是在“异”中求“同”，他们西方人是在“同”中求“异”；要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就要“求同存异”。基辛格当时说这番话有无政治背景，我们不得而知；但它确实反映了东西方不同民族思维方式和角度的显著差异。这一点早在19世纪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就曾经明确指出：“东方人见到了统一忽视了区别，西方人见到了区别遗忘了统一。”（张泽乾《翻译百思》——第一次全国翻译理论研讨会论文）可见，东西方的思维方式和角度一直迥然不同。而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换言之，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所以东西方的语言必然存在着显著差异。

日前，已有不少学者从自身的翻译实践经验中悟出这一道理并总结出精辟的论断。姚念庚教授在《试就思维方式的差异论英汉语言的表达与翻译》一文中指出：“语言是思维的工具。表达法的不同反映了思维方式的不同。”许均同志在《论翻译的层次》一文中的论断就更加周密：“思维对语言的决定作用在于思维的不同角度决定了语言表达形式的多样性”，“思维方式与角度不一引起了表达思想内容的语言形式不一”。最近，语言学家申小龙教授在《汉语学习》杂志撰文《汉民族文化通约散论》写到：“各民族思维习惯不同，必然深刻影响与之相应的语言形式。”申先生通过对西方游牧民族思维习惯的研究，揭示出与之截然不同的汉民族在其思维习惯上的三大特点：整体思维、辩证思维和抽象思维。据此，我们看到，汉语同西方语言的差异性绝对的、必然的，其相同点则是相对的、偶然的。这就为我们以一种思维的科学——逻辑学——为依据来研究解决翻译问题提供了哲学理论基础。

正是东西方民族思维方式和角度的差异性导致各民族文化的不同，从而决定了东西方语言形式的多变性。例如，西方

语言中的“铁钢工业”和“我从脚到头(或者:从下到上)打量着他”这些常见说法,在我们汉语中的合理表达形式则是“钢铁工业”和“我从头到脚(或者:从上到下)打量着他”。此时采用颠倒语序译法的理由,人们常常概之以两种语言习惯不同。其实,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解释。这里颠倒语序的译法,其根本的依据在于东西方民族对这两件事物的思维方式和思维角度不同。

由此可见,既然两种语言的差异来自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思维角度,所以解决翻译问题,衡量译文质量的优劣,也就必然以译入语的语言逻辑为基本的尺度和准绳。就是说,译者必须养成从逻辑上判断自己的译文是否准确的习惯,一旦发现译文不合逻辑,就要重新思考,修改译法。关于这一点,吴世醒同志在《论翻译技巧》一文中说得就更加明确:运用翻译技巧,不能是盲目的,必须根据语言所依循的思维方式。……必须以两国语言的思维方式为指导,就是说英译汉,必须根据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去变革英语的组织及其表达形式,才能写出合乎汉语习惯用法的译文。郑泽生等著《俄汉翻译教程》上册第71页也明确指出:“从逻辑学的角度看,俄语汉译就是根据俄语的语言材料,运用汉语进行第二次思维的活动过程。”

第三节 翻译活动的哲学实质

“翻译是语言活动”这一传统的翻译语言学理论,在国内外翻译史上曾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各国翻译事业的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但是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国都在实行改革开放,从而打破了各个民族闭关锁国的局面,扩大了各民族视野,沟通了各民族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各民族意识形态和文化的

交流,大大增加了各民族语言的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研究的气氛。于是,人们从大量的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研究中逐渐领悟到:传统的翻译语言学理论需要更新,“语法+词典”这一形式主义的翻译模式必须打破。这是因为我们应该对各民族的语言文字具有科学的理解:语言文字是有机的、动态的、发展的,是随不同语言环境的改变而变化的。

诚然,翻译活动一时一刻也离不开语言操作,翻译学的确是借助于语言去认识客观世界,去描述客观世界,从中探索翻译的自身规律,研究翻译的理论、原则和方法。但是,翻译实践证明,在两种语言翻译的全过程中所接触的语言因素,仅仅是入门的向导而已。一经深入翻译,触及翻译活动的实质,所牵涉的远远不只是表层结构的语言因素,而主要是深层结构的非语言因素。翻译中的非语言因素是大量的,普遍的,单纯通过语言操作是无法解决的。正如法国翻译家卡里在《现代世界中的翻译》一书中所讲:尽管翻译涉及语言陈述,但却不是一项语言操作。翻译的性质极其复杂,文学翻译是一项文学操作;一个剧本的翻译不是语言操作的产物,而是剧作活动的产物;诗的翻译,是一项诗作活动;其他各类翻译,如此类推。这里,显然是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对翻译活动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也就是说,是特定语言环境里思维活动的来龙去脉对两种语言的翻译起着关键的作用,是特定语境中的逻辑联系对翻译起着决定作用。

由此可见,就翻译的实质而言,从两种语言差异的来源与解决各类翻译课题的关键来看,翻译科学,应当归属于应用逻辑学。列宁从问题的另一个角度所讲“逻辑是各种科学的经验的总结”(卡拉瓦耶夫《关于时间逻辑的研究》,颜华东译,《逻辑与语言学习》,1990年第1期)此一论断,也清楚地证明了